

满文及满文文献

赵令志*

만주어(滿文)는 청대에 ‘淸文’이라 불리었고, 청대 300여 년간 사용된 국어였다. 그래서 세계 각지에는 수많은 만주어 문헌들이 남아 있어 청사(淸史)와 중국 민족사 연구의 중요한 자료가 되고 있다. 만주어 문헌들은 대체로 만주어 서적·당안·지도·비각·도장·편액·화폐·목패 등으로 구분될 수 있는데, 온갖 종류가 다 갖춰져 있으며 그 가치 역시 결코 적지 않다. 청 황제가 물러난 이후 중국에서 만주족을 반대하고 배제하는 민족정서가 나날이 고양되면서, 만주어와 그 문헌 또한 비방을 받고 버려지게 되었다. 하지만 중국 내외에서 청사와 중국민족사를 연구하는 학자들은 일찍부터 만주어문헌의 가치에 주목하였는데, 특히 최근 ‘新淸史’의 영향을 받은 소장학자들은 만주어 문헌의 정리와 이용에 더욱 관심을 기울이고 있다. 그럼에도 만주어 문헌들은 상당히 분산되어 있어, 최근까지도 만주어 개신과 응용 및 문헌 등의 문제에 대해 학계는 자신의 해석만을 고집한 채 일치된 대응을 하기 어려웠다. 본문은 이러한 문제들을 간략히 정리하여 학자들이 참고할 수 있도록 돕고자 한 것이다. [필자]

满文在清代被称为淸文，乃清代近300年使用的国语，故于世界各地保留了大量的满文文献，是研究淸史及中国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满文文献大体可分为满文书籍、满文档案、满文舆图、满文碑刻、满文印信、满文匾额、满文钱币及木牌等，可谓种类齐全，价值不菲。但自淸帝逊位以后，中国反满、排满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导致对满文及满文文献亦诋毁或丢弃。而国内外研究淸史、中国民族史的学者，早已注意到满文文献的价值，特别是近来受“新淸史”的影响，青年学者更加注重对满文文献的整理和利用。然因满文文献比较分散，故迄今学界对满文的改进和应用及满文文献等问题，仍各执其词，莫衷一是。本文冀就此类问题，略作整理，以资学者借鉴。

* 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

近几年来，由于国外学界日益重视满文，尤其受美国新清史的影响，中国国内学界亦逐渐注重非汉文文献的研究和利用，研究清史的学者们，认识到了满文文献，蒙古文献，藏文文献等文献的重要性。在此环境下，近十年左右，国内外兴起了学习满文热潮，目前有许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为了将来从事满学或者是清史研究，都在学习满文。另外，有许多满族聚居地方，为了挖掘满族文化，甚至在部分小学里开设满文课程。

就研究满学和清史而言，我觉得学习满文是有必要的，因为有清一代它是国语，因而留下大量满文文献。满文在清代称作清文或清语，国语，所以在检索《清实录》或《大清会典》中有关满文资料时，若输如满文的话，是找不到的，必须检索清文，清语或国语类条目，才会检索到相关内容。

一，满文创制与改进

我们知道，金代的女真人创立了女真文，有大字，小字之分。这种文字当时是根据汉语的偏旁部首来创制的，所以存在缺陷，不能很完整地拼写阿尔泰语系的粘着语语言，必须分开写，对女真语存在的词头，词中，词尾变化问题，难以完整标识。因文字与语言脱节，给学习和利用过程中带来诸多困难，故该文字在应用一段时间后，尤其金朝迁都北京以后，这种文字应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渐地被汉文取代了。到元明时期，东北的女真人中懂女真文者已极为稀少。

明朝从洪武年间开始招抚女真人，到永乐年间进入一个高潮期，对前来归附的女真各部，明朝分别设立卫，所，对其头领分别授与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职，要其统辖所部，定期朝贡。身为明朝的官，必须与明朝交往，他们又不懂汉语，所以在有事奏报时，奏报的文字就成了问题，各部所用文字不一，表述亦有问题。所以在1444年，女真部的一些首领就向明朝建议，申请以后具折上奏的时候，请用鞞鞞字，即用回鹘体蒙古文，得到

明廷准许。从此以后，女真地区的来文，都是蒙古文，里边亦有些是用蒙古字母拼写个别女真语的情况。明朝设立了四夷馆，专职翻译和处理对边疆民族的文书往来，其中即有女真馆，女真馆来文实际是蒙古文。据此可以推断，在明代中叶以后，女真地区有许多精通蒙古文的女真人或蒙古人。

到努尔哈齐时期，实际上在东北的女真各部，通行的仍然是蒙古文。努尔哈齐起兵以后，归附的人越来越多，对文字的需要也越来越明显，所以他令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文字。额尔德尼等不知如何创制，努尔哈齐告知，以蒙古字母“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满洲实录》卷3），即按回鹘体蒙古文的字母，创立了满文。

在所有的民族历史文献中，都有一个民族英雄或民族首领事迹的成分。满文文献中，如《满文原档》等里面记载努尔哈齐之事迹颇多，其实并非皆为其个人所为。上述《满洲实录》之记载，好像是说努尔哈齐让额尔德尼等根据蒙古字母如何拼写女真语的，实际蒙古文在女真地区已经通行了一百五六十多年了。从女真馆来文可以发现，在努尔哈齐没有下令创制满文前，有的人就用蒙古文字母在拼女真语了。我觉得利用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绝非努尔哈齐首创，应该说，经过额尔德尼等改进，是将拼写字母规范化了，进而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满文字母，女真社会复有了一套系统的文字，此乃1599年创制的满文，即老满文。

老满文创制以后，应用很广，用于记载各种档案等。但在应用过程中，就又发现问题，即许多音在文字中难以区分，如ta, da, te, de, ga, ka, ge, ke等等，所以出现dergi与derhi, aha与aga之类词汇混淆的问题。此问题在蒙古文中既长期存在，所以不懂蒙古语的人，学蒙古文很费力。而会蒙古语的人，学习蒙古文要相对简单些。所以在1632年皇太极让巴克什达海改进满文。史料里记载是达海，实际还有库尔缠等许多人。他们将老满文加上了圈，点以区别读音，这样就形成了新的满文。并且增加了十几个特殊的字母，用来拼写外来语的音，如此加上了圈点，又增加了一些特殊字母，所以满文就非常完善

了，此乃新满文。有了圈点以后，就能完整地标识满语的读音，便于学习，利用，并能拼写任何语言，因而新满文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文字。最近，我见到了许多舆图，其中有清代蒙古各部游牧图，是蒙古文的，但其中有许多地名，是用满文拼写的。据许多蒙古学者研究，用满文拼写，比蒙古文准确。我在进行满文文献调查时，在内蒙古发现许多蒙古文的翻译著作，如《西游记》等，其中的满文地名，人名都用满文写，其原因有二，其一，可能底本为满文本，其二，即满文拼写更为准确。从中可以证明新满文的字母非常完备。在清代，用满文拼写俄文，英文，其准确度远胜于汉文。

到乾隆年间，入关一百二十多年以后，显露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满语日益衰微。在京城内城由八旗分方位驻守。京城之旗人即有满洲，亦有蒙古，汉军及大量内务府旗人，汉人等购产入内城居住者，明显增多。居住人群的变化，导致满洲人的满语日渐衰落，为稳固八旗根本，保护民族文化，乾隆帝欲振兴“国语骑射”。“国语”当然就是指满语。当时乾隆皇帝认为导致满语衰落的原因之一，是满语里边的汉语成分越来越多了。

女真族本属于渔猎民族，其固有语言里渔猎经济文化之词汇特别丰富，伴随其逐渐进入农业地带，其本不存在的政治类，经济类方面的语言，便出现许多汉语词汇，并将其满语话。这类词汇，在满语内占有相当的比例，如“laba, defu, puseli”, hesari, puselembi, maimailembi等，既有名词，亦有以汉语为词根的动词。乾隆皇帝意识到这类词汇对满语文弱化的影响，因而在修订刊刻《御制增订清文鉴》时，对《御制清文鉴》的一些词汇进行修订，弱化或消除满语文内的汉语成分，或挖掘女真语内固有词汇，或创立许多新的词汇，比如“仓”，原来就拼“ts'ang”，乃汉语“仓”音，对此专门创一个词“calu”，便没有汉语痕迹了。如此挖掘，创立而修改的词汇和修订的语句，按《御制增订清文鉴》序中所言：“新定国语五千余句”，即增订达5000余处，可以说，这次变更的词汇和常用句子的数量非常大。我们现在翻译满文档案，我有个体会，即满语的基本词汇能掌握2500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其中有些词汇是可以变化的，尤其是名词动词化，动词时，态，式的变化等，可以使2500左右个

词汇，大约变成6000多个单词，再掌握满语文的语法，就可以翻译利用满文档案了。此次改进词汇等达5000多处，应该说在词汇方面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把此次修撰《御制增订清文鉴》视为满语文的又一次革新。我们现在注重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太多，所以在座的诸位，可以对此问题，即将《御制清文鉴》与《御制增订清文鉴》的词汇等变化，进行对比研究，会作成一篇非常出色的博士学位论文。但要有心理准备，这是个事倍功半的工作，比较艰难。

谈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联想到乾隆三十三年刊刻《旧清语》，因这些词汇基本从前三朝实录内摘出的，所以又被翻译为《实录内摘出旧清语》，其满文书名为fe manju gisun i bithe，翻译为《旧清语》即可。

关于此书，赵志强先生已出版专著，进行详细研究，不在此赘述了。大家需要知道的是，《旧清语》的整理，刊刻，是挖掘，整理入关前的女真语，而不是将满语去汉语化。两者之间或有联系，但有很大区别。我要强调的是赵志强先生能将800个旧清语词汇研究出一部67万余字的著作，所以，我所说的研究乾隆时期更定词汇的课题，是可行的，若太大，可以分批来作。

以上讲了满文的创制和改进问题，有的问题是我自己的体会，尚未有专论，可能不成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关注。另外，满语文的改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清高宗实录》内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对“风俗”一词的上谕，就说明此问题。

与满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满文的字体。满文楷，行，草，篆等几种字体。楷书一般用在刊刻，许多精写本也用楷书。行书，乃平时之书写体，一些档案等皆为行书。草书，有些书信或者有些地方的档案，还有皇帝的朱批，有很多草体。草体字迹潦草，没有一定的词汇量并掌握草书的规律，很难看懂。

另外还有篆体，满文的篆体是乾隆十三年才创制，创了三十二种篆体。感兴趣的话，大家可看看《盛京赋》或者《御制盛京赋》，系用各种篆体分别书写的。

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安双成先生正在研究满文的篆体，安老先生对满文篆体颇有心得，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向他请教。我的两个学生，准备编写满文篆书辞典，让我给否了，原因是学术价值不高。满文的篆体基本应用在玉玺和官印上，当然是乾隆十三年以后的玺印，但亦有非篆体者。

此外，还有匾额体，专门题写额匾。关于满文匾额问题，故宫博物院的春花有专论研究，可以参考。满文还有许多碑刻，有人将其成为碑刻体。清代满文的碑，多为合璧碑，受汉文有碑刻体之影响，所以亦有满文碑刻体之说。我看其与楷体无疑，不知是否准确。

二，满文的作用

清代的满文作为国文，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首先它要体现国文的作用，那就是国家颁布许多典政朝纲的政书以及敕书，条约等，都要用满文。清代《大清会典》，《实录》，《圣训》及各部则例等政书，官书，首先都有满文本。有的同时有汉文本，有的没有，但是满文本是必须有的。

另外向属国颁发敕书，必须有满文的，另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字。与外国签订条约，在清中前期基本都用满文，如《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清朝方面使用满文签署。

在文移往来方面，清代规定办理宗人府事务，内务府事务，八旗事务，军政事务，边疆事务，民族事务，还有陵寝事务的官员，必须用满文折奏。若满文达不到折奏的水平，就不能做这个官，侧面促进了满文的学习和应用。因而清代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文献，尤其是这些上述事务相关的满文文献非常多。如宗人府事务的文书，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前，所有的《宗人府堂稿》全是满文的，以后的有满文有汉文的了。还有担任边疆事务，民族事务的大臣，他必须用满文来写奏折，有关这些事务的档案基本是满文的，因此，研究清代边疆史，民族史，不看这些满文档案，有些问题难以深入。这也是国内外学者赞成

新清史学者提倡用非汉文文献研究清史的原因之一。

因满文是国文，所以在官方的应用上比较突出，留下的文献也比较多，而在民间除应用外，留下的文献特别少。目前在民间留下来的满文文献，多在达斡尔族、锡伯族居住的地区，侧面反映出满语文在这些地区的作用。

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在雍正年间就编入到布特哈八旗，后来有一部分被拨入呼伦贝尔八旗。他们在清代应用的文字就是满文。到清末，有几位达斡尔学者，他们像努尔哈赤让额尔德尼和噶盖创满文的时候那个样，依据满文的字母，创立一套拼写达斡尔语的文字，被称为“达呼尔文”。因而，到莫力达瓦等地调查文献，会发现其中满文文献读不懂，其实是达呼尔文文献。因其与满文文献差距不大，且数量有限因而没有引起注意。

在达斡尔族地区保留下来的文献，其实多为满文文献，种类有小说、历书、萨满神本等，多为满文抄本。另莫力达瓦图书馆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档案，也是满文的。

2011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搞了一次满文文献的调研，东北由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满文处处长吴元丰先生负责，他在莫力达瓦见到了一份1967年的遗书，是用满文写的，可以证明在1967年在这个地方还在应用满文。满文在这个地区使用到“文革”前，其实很正常。呼伦贝尔地区进入民国以后，仍沿用呼伦贝尔副都统统辖。现在留下两部满文“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衙署)档案”，一部保存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是清代的副都统衙门档案。另一部保存在呼伦贝尔市档案馆，是民国时期呼伦贝尔副都统衙署档，这批满文档案截止时间为1931年，即建“伪满洲国”，在该地设县，取消副都统衙署后。从档案文书可见，该地区在1931年之前，应用的文字是满文。30余年后，到1967年，民间仍有利用满文的情况，便不足为奇了。此乃满文在达斡尔族民间应用的情况。

另一个在民间应用的特例，当属新疆锡伯族对满文的利用问题。乾隆中叶，从盛京驻防内选一千丁锡伯人，计三千余人到新疆伊犁去驻防，这批人到驻地以后，过着纯军事化的生活，对外相对封闭，所以保留了乾隆年间的

满语，并且保留了大量的满文文献。文献多是抄写的小说和历书，如《列国志》，《三国演义》等，甚至有专门从事抄写之人。我见到许多毛笔的抄本，满文写得非常漂亮，不次于清代笔帖式所写。1947年有几位锡伯学者，根据满文，修改了几个满文字母，创制了锡伯文。实际上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仍然是满文字母，但锡伯族基本都说遗留下来的文献，为锡伯文文献。我觉得应以1947年为界限，1947年之前的，应该为满文文献，1947年创制锡伯文后，其中利用了锡伯文字母者，方可称为锡伯文献。其实此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无论怎么说，新疆的锡伯族保留了满语，留下了大量满文文献，甚至今天能够真正研究满文和满文文献的学者，锡伯族居多，且水平较高，因而在利用满语文，保护满语文方面，新疆的锡伯族功不可没。

此外，满语文对东部的蒙古语有一定影响，在科尔沁，昭乌达的蒙语里边有好多满语，此乃受满蒙通婚的影响。这些部落在清代有很多公主，郡主嫁到那里。嫁过来的时候，带来许多陪嫁人。到蒙古地区后，他们仍用满语交流，所以有些满语词汇就融到蒙语之中，如在科尔沁，他把孙子就叫“omolo”，这是满语。而蒙语里头有固有的孙子这个词，他们这一地区却不用了，而在西部却仍然用固有的蒙语词汇。此类词汇有很多，抑或可视为体现满语文应用之内容。

三，满文之文献

满文的文献，大体可分为书籍，档案，舆图，谱牒，碑刻，木牌，钱币等类的文献，其中档案量最大，书籍次之，其余存量比较小。

目前，对满文文献的分类尚未统一，有按四部分类法分的，也有按种类分的，我觉得目录为对文献整理和利用的工具，哪种方法都可以，只要能够完整地反映该文献的特点即可。我给此讲坛交了一份满文文献的目录，是按我编写的《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的四部编排方法作的。但从我多年讲授“历史文

献学”的经验来看,《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撰写书籍比较方便,且分类清晰,而要用此法讲课,因全是书目,便太枯燥了。因此,今天我们以种类分类法,来谈满文文献问题。

1. 满文书籍

如前所述,满文因为是清代的国语,因而清代许多重要文献,都有满文本。此类满文文献既有刊刻本,也有抄本和写本;既有纯满文的,还有许多是合璧的或者是多种文字混合的;既有官修的,也有私撰的;既有用满文原创的,也有翻译的。可谓种类繁多,内容广泛。

用满文官修类的书籍,主要是圣训,实录,政书,方略等类的书籍。

先谈实录:中国封建王朝历来有修实录之传统,可惜许多实录都遗失了,现在我们见得比较早的是《梁武帝实录》残本。但《明实录》,《清实录》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明清史的重要史料。

修实录之传统为,新皇继位以后,便成立实录馆,编修前朝圣训,实录。圣训乃前朝皇帝对某些问题的训谕,实录馆臣现将所有圣训辑录起来,择选其中哪些内容可以入实录,因而实录是以圣训为纲,时间为目编排的。满文“实录”为“yargiyan kooli”,乃“实实在在的,确确实实的例”的意思,这才是实录的真正含义,因而,修实录实际是在修“例”,修撰完毕皇帝钦定后,并不公诸于世,而是储于皇史宬,留作后世子孙执政参考。所以大家要注意,修实录不是修史,而是在修例。但在某个王朝灭亡后,其实录或被焚毁,或被流传之坊间,后世之人因其史料价值颇高,便将其作为史书了。在目录分类上亦不将其列入史部政书类,而是列入编年类。

清代的实录用满,蒙,汉三种文字抄写,因而各有满文本,汉文本和蒙文本。到目前为止,三种文字的文本如何成书的问题,尚有争论。或言先修了满文本,再把它译成汉文本,亦有言先修汉文本再译满文本者,没有争议的是蒙文本肯定是从满文本翻译的。个人的意见是,从实录馆臣组成和所引用的满文,汉文资料来看,满文本,汉文本是同时修纂的,负责满文本和汉文本

的馆臣，都在实录馆总纂领导下，他们在利用满文，汉文资料时，是彼此沟通，及时翻译并确定选用的。从内容上看，前三朝的实录，可能倚重满文资料更多，汉文实录内保有满文文献的痕迹更多些而已。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可以将满，汉文本对照，来研究实录的内容及其编纂问题，不过这个题目更难，因为必须要找到前三朝实录的初编本，不能用乾隆年间的修订本，即我们现在常见的版本，另外还要以原始档案为辅助资料。即需要有历史功底，还要具备满文，汉文的校勘学功底。不知将来有哪位学人，知难而上。

另外会典，还有各种则例，都是规定国家典政朝纲及各部办事章程，无疑都要用国语来书写，因而都有满文本，但会典，则例，基本都有汉文本，概因实施者和实施对象多为汉人所致。

也有几部是纯满文的，而没有汉文的，如我们翻译的《钦定拣放佐领则例》，藏于国家图书馆，是一个孤本，纯满文的，内容是补放勋旧佐领和世管佐领，解决这些佐领承袭问题的。其内容不涉及八旗蒙古，也不涉及八旗汉军，仅涉及满洲内的部分佐领，因而没有必要翻译成汉文或蒙古文，有满文本即足可应用了。

满文书籍除官修者外，亦有一部分为私撰的，如《随军纪行》，《官便漫游录》，《异域录》，《百二老人语录》，《闲窗杂梦》等，数量不多，但都很珍贵。

《异域录》的汉文本很通行，但它肯定是先有满文刊本，后来才很快就有了汉文本。满文本很少，现在能见到的仅在北大图书馆有一部刻本，刻得很漂亮。名称不叫《异域录》，满文的意思是“出使各国记”。该书在二战之前，日本学者今西春秋介绍过，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后来一直没找着，前两年才找到并确认。台湾故宫博物院庄吉发先生是根据北大的版本，作了《异域录》的译注，使我们大家今天都能够见到该书了。前几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郭美兰研究员发现了此次出使后，正使殷扎纳上了一个奏折，就是汇报该次出使的折子，这个折子非常长，全是满文的，内容占

《异域录》(《出使各国记》)的一半左右,和《异域录》对比,发现主要的事和这个《异域录》记载一样,其中的许多琐事被删节了,因此可以说殷扎拉的奏折与《异域录》密切相关,其先有满文本便毫无疑问了。将殷扎拉奏折和《异域录》作比较研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

《百二老人语录》是乾嘉时期的重臣松筠写的满文著作,其以讲故事的方式书写,但其中体现出了旗人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东西比较多,目前在日本对此书颇为重视,中见立夫教授也作了许多相关研究,但仍有研究的余地。该书与嘉庆年间由松筠同旗的富俊译成了汉文。所以我们见到的既有满文本,又有满汉合璧本,但该书原本为满文本。因该书既有满文本,又有满汉合璧本,又以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容易理解,且单词量比较大,所以我让学生们学习满文时,就读该书。

还有《闲窗杂梦》,该书是一部满文日记孤本,现在藏于日本大阪大学箕面图书馆,我们将该书整理,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作者一直被认为是大学士松筠,但我们在翻译时发现作者的生活,与大学生松筠的生活毫不相干,里边记载的全是老北京的普通生活,所以否定其为大学生松筠日记,而是号为松筠的六品包衣达穆齐贤的日记。其所记值班,会友,喝茶,聊天,购物,饮食及处理婚丧嫁娶等内容,对研究清代北京社会史和老北京的生活,风俗等,价值很高,因而引起研究北京社会史的许多学者的关注。

因时间关系,就不对其他书籍做一一介绍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在满文文献中占多数的翻译文献。

翻译类文献主要是从汉文,藏文,西文等翻译过来的文献。

从汉文翻译过来的文献,多为经学,史学,文学及兵书,医书,历书等类的书籍。

清代对四书五经及相关经书的翻译,非常精准,可以作考据,校勘的依据。尤其在经意的解释方面,因为满文没有文言文,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西方比较早研究满文的是德国人。我们知道,德国的哲学很发达,他们比较注重理性思维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哲学著作具有兴趣。但他们得到四书五经后,

因汉文深奥，难以释解，当发现满文本的特点后，就开始研究满文，以求甚解。当时的满文译本，最能体现清代的文字训诂水平，对经意的解释最为精到，因而满文本的四书五经在释读经意方面亦具有重要价值。

另外满文《大藏经》的译本，也是从汉文《大藏经》翻译过来的。这个问题知之者甚少，都认为翻译满文《大藏经》时，蒙文《大藏经》已经早就刊印，蒙文，满文相似处多，应该底本为蒙文本。而实际上，乾隆认为蒙文本中问题太多，翻译不精，经意翻译不及汉文本，故让三世嘉呼图克图主持翻译满文《大藏经》时，根据汉文本翻译。当然，翻译者多精通蒙古文或藏文，翻译时可能参考了蒙文本或藏文本，但底本是汉文本。

对史学著作的翻译比较早，入关前，就翻译《金史》和《辽史》，顺治三年分别刊刻，刻本非常大气，漂亮。入关后，翻译的史学著作更多，如《资治通鉴》，《通鉴》，《通鉴纲目》等。这些满文本的史书，注意其原刻本和翻刻本。

文学类的著作也在入关前就开始翻译，如《三国演义》等，入关后翻译的小说更多，如《列国传》，《西汉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西厢记》等近百种。

我们在新疆察布查尔调查的时候，发现许多锡伯族家里都保存着祖上传下来的抄写的小说。他们祖上过着军营生活，到晚上，许多家人或者邻居们聚在一起听书，即是娱乐，亦寓教化子弟忠义礼智信的思想于其中。念书的人连说带唱，这是秉承北方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的说唱艺术，所以许多人家都抄写《三国演义》等小说，有的抄得非常漂亮。甚至有人专门以抄书为业。我们调查其中一户，发现他家的《列国志》的抄本非常好。主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爷爷给抄书人做了一套车换来的，可见普通人家亦设法抄书，因此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虽然“文革”中烧毁很多，但至今保留着大量满文本的古典小说。

翻译的满文本兵书主要有《孙子兵法》，《孙吴子兵法》，《黄石公素书》，《六韬三略》，《武侯心书》，《射的说》等。

医书主要为《难经》，《脉论》，《药性赋》，《天花探源》，《妇科疗法》，《热疹治疗》等。

另外还有一些从西文翻译的著作，如《新约圣书》，《基督生平》，《教义问答》及《骸体全象》，《几何原本》等。

另外一类不能忽略的书籍是满文的字辞书，其种类繁多，涵盖字辞书的各个方面，数量在满文书籍的五分之一左右，且不仅仅为两种文字之互释，尚有三种，四种，五种文字互解者，在世界字辞书中亦属罕见。现在一些学者对满文字辞书进行研究，如江桥对《御制清文鉴》和《满蒙汉三体清文鉴》的研究，春花所著《清代满蒙文辞典研究》，及季永海，和希格，塔依尔江等人的研究成果。另外日本，韩国对满文字辞书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他们主要利用电脑设备，对满文字辞书进行信息化处理，编程并制作全文检索平台。

总体来说，我们对满文字辞书的整理利用的还不够深入，全面，近百年来国内外编纂了一些新的满文辞典，利于应用，其内容基本都是依据清代的部分相关字辞书编写的，内容仅涉及满汉，汉满互释，远不如清代字辞书种类多。我不是说现代编的辞典不好，但还是劝大家接触一些清代编订的字辞书，会更开眼界。

关于满文书籍，最后要说一说多种文字合璧文献的划分问题。

现在民族文献划分比较混乱，没有一个具体规定，所以多种文字的民族文献，便会在不同语种内重复编目，如《御制满蒙文鉴》，即属于满文文献，亦被列入蒙文文献之中。但也有有的地区，把满蒙文合璧的文献，仅列入蒙古文文献中。

清代的合璧文献非常多，满，汉，蒙，藏，维，托忒文合璧的字辞书多，其中一般书籍中夹杂满文者也不少，如蒙文中夹杂着满文，甚至汉文书籍内满文夹杂满文的也有。我觉得这类书籍，应该各种文字的文献内分别著录，才能体现此文献的特征，若仅著录其一，便与其他书籍没有区别了。

举个例子，我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见到一部满文文献，名为《赫舍里氏家祭条规》，但里边只有一个满文词“萨满”(saman)，还少一个牙儿，写成

“sama”了。他们将其列为满文文献，我觉得可以，虽然有一个满文词，还写错了，但能体现该文献的满族文化内容。

2. 满文档案

清代及民国留下来的满文档案数量较大，现在尚未完全整理著录，所以估计约有一千多万件，分为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宫中，盛京内务府，八旗都统衙门，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等全宗，主要由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臣工进呈的题本，奏折，揭帖，表，笺，启，各衙门间往来之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原件或录副等组成，除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者外，主要藏于北京，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西藏，新疆，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国外的部分图书馆等。

满文档案除上述文种之原件外，另按种类编成各类档册，如内阁之黄册，史书，秘本档，清折档，票签档，秘书院档，国史院档，蒙古堂档等；军机处之月折档，月折包，上谕档，议覆档，准噶尔档，夷使档，熬茶档，北路军务档，土尔扈特档，西藏档，巴布勒档，廓尔喀档，金川档，俄罗斯档，班禅事件档，年班进京回番档等，内务府之奏销档，上传档，行文档，来文档，红本档，消费档，钱粮册等专档，分别成册，记录专题，是研究各类专题的重要档案资料。目前，利用奏折，题本，谕旨，寄信等者较多，而利用档薄者少，应该注意这部分特殊的档案。

因时间有限，所以对满文档案的分类和整理等问题，我就不在此细讲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吴元丰先生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将来请他来作讲座，他会给大家细讲。

关于满文档案的价值，现在大家日益发现其在研究清史，民族史方面的重要性。前面提到的满文书籍，许多有汉文本，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研究清史要利用满文资料，实际多指要利用满文档案。能够翻译利用满文档案，你就不会

为没有论题, 缺少资料发愁, 而且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也会有所创新。

3. 满文舆图

舆图包括天文, 舆地, 江海, 河道, 武功, 巡幸, 名胜, 寺庙, 山陵, 风水等类之图, 故舆图种类很多, 非仅为今天的地图。清代很注重舆图, 所以清代的舆图发展可以说在古代达到鼎盛期。尤其是康熙皇帝, 他很注重西方的算学, 向传教士学习算学和测量学。康熙走到哪儿, 他自己都要测当地子午线, 并开始尝试以经度, 纬度来制作舆图, 和原来凭着奏报所画的示意, 形势图不同, 清代的舆图更为精确了。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着一幅《大明混一图》, 是满文的, 大家会奇怪, 大明朝的图, 怎么会是满文的呢? 因为清朝人很注重这幅舆图, 所以把明朝留下这张图的汉文地名, 都用满文的字签贴上, 所以这幅舆图便成了满文地图。这幅图很知名, 一直画到非洲, 所以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来了后, 许多人都要看看这幅图, 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历史时期, 尚没有自己的舆图。但这幅图是一幅示意性的概念图, 方位尚准, 面积偏差过大, 海南岛的面积是台湾岛的两三倍大, 可见其不够准确, 连细谷良夫先生家里藏的《大明地理图》都不如。更难以和清代的舆图相比。

清代所绘的舆图, 长城以外的地名, 基本都是用满文标注的, 一幅图中, 南部用汉文, 北部用满文, 这也是清代舆图的特色。但北部的局部图, 都是用满文标注的, 即满文舆图, 这类图非常多, 现在主要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 国家图书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处, 可惜我们国内的舆图, 密不示人, 难以利用, 因此, 我们国内的满文舆图研究成果非常少。近年来, 在日本的承志先生在研究满文舆图, 写了几篇好论文, 他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另外如《热河行宫图》, 《班禅行帐图》等, 均以满文签注, 可谓另类满文图, 这类行帐图现在也留存许多。

4. 满文谱牒

满洲人注重家谱同汉族一样，与敬祖有关，亦与各家世袭继承披甲，领取钱粮，明确继承资格相连，此为该族家谱之特殊之处。满族的家谱现在留存很多，既有宗谱，亦有支谱；既有谱书，亦有谱单，既有满文的，亦有满汉合璧或汉文的。因“文革”破“四旧”的影响，现存于家族内满文的家谱较少，多是最以汉文编修的，但亦有一些满文的谱单，在民间得到很好的保存。满文家谱多收藏于国内外的图书馆，博物馆内，或大学研究所内，如吉林师范大学之八旗谱牒馆等。收藏于个别学者手中者，也有一定数量，但满文者不多，且多为复制本。

现在保存最好的满族家谱，当属宗人府修的《玉牒》，有满文的，也有汉文的，乃爱新觉罗家族的之谱书。《玉牒》隔九年修一次，清代总共修了二十八次，每次缮写大，小各三部，分藏于皇史宬，宗人府和礼部(乾隆八年规定存礼部者送盛京敬典阁)，现在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乃研究清皇族的重要资料，杜家骥，赖慧敏，郭松义，鞠德源等先生据此作了许多相关研究，可以借鉴。另嘉庆二十二年后缮写《星源集庆》，乃宗人府进呈的黄册，红册汇编，可视作另一种皇家谱书。

清代乾隆年间，曾修佐领家谱，于我前面提到的《钦定拣放佐领则例》有关，乃为勋旧，世管佐领承袭相关，故此佐领家谱亦称世袭谱。

除这两类谱书为官修者外，满族的谱书都由各家族编修。汉族有隔六十年续修谱书，龙虎年修谱单之俗，满族也有于龙虎年修谱的习惯。但从现存谱书，谱单来看，亦非皆为龙虎年编修者，所以，满族并非谨遵龙虎年修谱之俗。

关于家谱的史料价值，近年来愈来愈为史家倚重。其乃研究家族史，人口史，经济史，社会史，移民史等的重要资料。我们国内有几篇研究满文家谱的论文，但总体来看，利用满文家谱研究满族史，尚嫌不足，可以进一步发掘利用。最近美国的清史学者开发出了谱牒，册籍分析软件，输入部分类似的家谱，就可以分析出各方面的数据，我觉得家谱中心具备利用这种软件研究的前提条件。

5. 满文碑刻

满文碑刻和拓片非常多，但纯满文的不多。多数都是满汉合璧，满蒙合璧的，或者满，蒙，汉，藏等合璧的，甚至有满，蒙，汉，藏，托忒，维吾尔文合璧的下马碑文。

清代留下来满文碑刻，多是记功碑，功德碑，谕祭碑，下马碑等，其中满族大臣之功德碑，谕祭碑等于清代赐谥，丧葬制度有关。最近辽宁民族出版社准备出版李林先生收集的《满族碑石刻》，应该是搜集满文碑刻较全的书。

6. 满文木牌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满文的木牌。女真人有记档传统，但因缺少纸张，故多写于木牌之上。直至皇太极时期，虽有纸张但为便于传递，仍有于木牌上记事之情况。至顺治二年，方降谕停木牌记事。

木牌乃随时削木而成，不加涂饰，形式各异，有的削制成薄片，两面记事；有的削制成长方体，四面记事。长，短，宽，窄亦不尽相同，大者长约30厘米，宽约4厘米；小者长约17厘米，宽约2厘米。木牌一端有一小孔，用以编缀成册，便于传递与保存。清杨宾著《柳边纪略》记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据此可以明确满文dangse之来源。

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木牌共28支。其中26支为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1935年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时所发现，另2支是197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理内阁杂档时发现的。这些满文木牌乃清武英郡王阿济格军中遗物，用新老满文交替阶段的满文记事，记载了阿济格于崇德元年(1636年)率八旗兵进入关内，在北京周围各地与明兵作战，攻克城堡和俘获什物数目，以及统兵之王，贝勒下达的命令等。

7. 满文钱币

入关前有满文abkai fulingga han jiha(天命汗钱)和sūre han ni jiha(天聪汗钱), 入关后, 不再用满文年号, 仅在背面用满文标注鼓铸之处, 如boo ciowan(宝泉), boo yuwan(宝源), guwang(厂), gui(桂), yuwan(原), tai(台), dung(东)等。概钱币通行全国, 经济发达之汉地识满文者有限, 故采取此既不误通行, 有可体现国语之标注方法。

8. 满文印信

满文作为国文, 当然要体现于象征国家, 地方军政大权的印信之中。清代之印, 有玺, 印, 关防, 图记, 条记, 铃记等类, 以形状, 质地, 印纽等区分, 级别各有不同。印文有单为满文者, 亦多合璧者。乾隆十三年发明满文篆体之后, 印信之满文多为篆体, 亦有非篆体者。

9. 满文匾额

在皇宫, 园苑, 坛庙及藏传佛教寺院的匾额, 基本有满文, 多为合璧者, 或满汉合璧, 或满蒙合璧, 或满蒙藏合璧等。许多匾额, 在民国年间被更换, 如故宫前殿之匾额, 均为汉文者, 而后宫之匾额仍为满汉合璧者, 后者乃因溥仪仍居之, 而未得换也。

满文的匾额可分为汉语音译借词匾额, 满文意译匾额, 半意译半音译匾额, 音译后加满文解释匾额等形式。

A, 汉语音译借词匾额

此类满文匾额较多, 约占总数70%左右, 如:

乾清宫(kiyan cing gung)

养心殿(yang sin diyan)

景阳宫(ging yang gung)

坤宁宫(kun ning gung)

交泰殿(giyoo tai diyan)

等等，不一一列举。

B, 满文意译匾额

此类匾额，多为国家坛庙方泽，关隘及北京，盛京，行宫城门，皇陵，藏传佛教寺院等之匾额，如：

天坛(abakai mukdehun)

地坛(ne i mukdehun)

山海关(šanaha furdan)

喜峰口(urgun jase)

天安门(abakai elhe obure duka)

正阳门(tob šun i duka)

隆恩门(baili be ujelere duka)

太和门(amba hūwaliyambure duka)

泰陵(elhe munggan)

慕陵(gūnihangga munggan)

弘仁寺(gosin be badarambuha juktehen)

永福宫(enteHEME hūturingga gurung)

雍和宫(hūwaliyasun hūwaliyaka gurung)

安远庙(gorokingge be elhe obure muktehen)

崇谟阁(bodogon be wesihulere asari)

三希堂(ilan hajingga tanggin)等。

C, 半意译半音译匾额

如：

师善斋(sain be alhūdara jai)

武英殿(horonggo yangsangga deyen)

寿皇殿(amba jalafungga deyen)

太和殿(amba hūwaliyambure deyen)等。

D, 音译后加满文解释匾额

此类匾额 系解释汉文者, 如:

永康右门(yung k'ang io men duka)

永康左门(yung k'ang dzo men duka)后加duka, 解释为“门”意。

应该注意的是在满文匾额中, 宫, 殿, 阁, 寺, 庙, 门等词汇, 即有汉文拼写者, 亦有满文gurong, deyen, asari, juktehen, muktehen, duka等满文固定词汇, 这类词汇, 多数是为了区别汉文音译而于乾隆时期创制的。

以上拉拉杂杂对满文创制与改进, 满文的作用, 满文的文献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满文文献存量较大, 且涉及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各个方面, 难免挂一漏万, 惟希望各界注意加强对满文文献的整理和保护, 既嘉惠学人, 亦可使这类珍贵文献得到完善保存。

参考文献

- 《清太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清太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内府刻本。
《北京地区满文文献目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附记：崇德年间本无铸钱记载，然近来东北出现满汉文“崇德通宝”，其满文不能释读，系伪造无疑。

투고일 : 2015년 10월 29일, 게재확정일 : 2015년 12월 20일